

美国“印太”联盟体系转型:措施、特征与限度

谢晓光 杜洞光

【摘要】随着当前国际力量对比的东升西降,“印太”地区成为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竞争的焦点,美国在这一地区构建的“毂辐”联盟体系开始向网络化联盟体系加速转型。“毂辐”联盟体系所发挥的制衡威胁、能力聚合与政治联谊效应难以支撑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部署,而联盟网络化反映了未来“印太”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的基本取向。美国及其“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在军事、经贸、科技、网络安全、情报与环境领域推行了一系列复杂措施共同推动联盟体系的转型,并具有威胁制衡、集群效应、议程多元、节点防御与区域联动五大特征。未来美国将继续推动联盟体系的网络化转型,但面临着美国自身的内外交困、美国盟伴对地区合作机制的疑虑和“印太”地区国家多重考虑等限制因素,以致其领导的“印太”网络化联盟体系如欲打造为对抗中国的“印太版北约”行之维艰。

【关键词】“毂辐”体系;网络化联盟体系;“印太”地区;“印太战略”;中美关系

【作者简介】谢晓光,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教授,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杜洞光,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沈阳 110136)。

【原文出处】《东北亚论坛》(长春),2022.6.54~71

【基金项目】2021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大委托项目(L21ZD035);辽宁省教育厅2021年度科学研究面上项目(LJKR0066)。

一、引言

(一)提出问题

随着当前国际力量对比的东升西降,权力转移速度逐渐加快,亚太(Asia Pacific)概念逐渐泛化并向印度洋—太平洋地区(Indo-Pacific)的概念拓展。“印太”地区开始处于地缘政治竞争的中心,成为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竞争的焦点。近年来,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一些盟友和安全伙伴已经开始在与美国的双边联盟框架之外扩大和深化以国防事务为主的各领域密切联系,即美国大力推动“毂辐”联盟体系(Hub and Spokes System)向北约式的网络化联盟体系(Networking Alliance System)转型。“毂辐”联盟体系是指不同盟友(辐条)与美国(毂轴)有着深厚的双边战略关系,但美国各盟友彼此之间没有这种关系;^①网络化联盟或联盟网络化是指美国与其地区盟友和伙伴之间相互交织的双边、多边安全合作安排的混合型联盟体系。^②美国及其盟友与伙伴推动“印太”地区联盟网络化已取得一定进展,如在“印太”地区搞所谓

的“二、三、四、五”的“团团伙伙”：“二”是“双边联盟”，包括美日、美韩、美澳同盟等；“三”是“奥库斯”（AUKUS），即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四”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UAD）；“五”是五眼联盟（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成，简称FVEY）。美国现在还想组建把越南、新加坡等更多国家都纳入进去的联盟。从上述经验性事实出发，亟待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美国为什么推动其领导的亚太“毂辐”联盟体系向“印太”网络化联盟体系转型？几个分支问题亦不容忽视：美国推动联盟体系转型的路径有哪些？核心特征如何？其发展前景达到何种限度？厘清上述几个关键性节点问题有助于考察当前美国“印太”联盟体系的最新进展。

(二)基本概念

美国“印太”联盟体系转型的核心概念为“联盟体系”与“联盟体系转型”，有必要对二者进行清晰的概念界定。传统意义上的联盟一般被认为是具有军

事防务性质的安全合作。美国当前领导的联盟内涵得到扩展,联盟行为不仅存在于军事安全领域内,也包含在国际政治、世界经济以及全球治理等更广阔的领域内。^[2]“联盟体系”是由主导国和多个盟伴(盟友+合作伙伴)为应对上述议题展开合作所形成的双边或多边制度性约束框架。“联盟体系转型”则是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美国领导的安全联盟将继续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安全形势,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为与强调共同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的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形成更强大的全球联盟关系网络。^[3]

我们可以用关系结构、联盟性质、成员数量、地缘范围、运作模式、合作议程、防范对象、基本目标、主要功能和盟伴选择标准来评估亚太“穀辐”联盟体系是否向“印太”网络化联盟体系转型,并将上述变量划分为核心变量与重要变量(见表1)。首先,从核心变量观察,传统的亚太“穀辐”联盟体系为攻防一体式安全联盟,只有一个主导国美国和五个盟国,而“印太”网络化联盟体系不是战时联盟,而是平时联盟,该联盟将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国家甚至域外国家囊括进来,盟伴众多;“穀辐”联盟体系具有明显等级性,即美国主导,其他盟友追随美国,一般采用双边主义的合作形式,网络化联盟体系更凸显使用小多边主义和伪多边主义协商一致进行合作的特征;“穀辐”联盟体系关注以军事合作为主的传统安全议题,网络化联盟体系在高级政治领域与低级政治领域并重;“穀辐”联盟体系建立的初衷为约束日本这样的二战战败国以防地区失序,并且防范苏联与其

争夺地区霸权,网络化联盟体系在稳定秩序的基础上更注重制衡中国这样的崛起国。其次,从重要变量来看,二者基本兼具稳定地区秩序和制衡潜在威胁的基本目标,但“穀辐”联盟体系更注重前者,网络化联盟体系更注重后者;“穀辐”联盟体系意在约束盟友,在某种程度上是展现美国霸权实力的典型联盟方式;在网络化联盟体系中美国使盟伴分担美国责任,延缓霸权衰落,所以需要借助更有实力的盟伴展开行动。

综上所述,当关系结构、联盟性质、成员数量、地缘范围、运作模式、合作议程与防范对象这样的核心变量发生变动时,无论重要变量是否发生变动,亚太“穀辐”联盟体系都开始逐渐向“印太”网络化联盟体系转型;当只有联盟基本目标、主要功能和盟伴选择标准这样的重要变量发生变动时,“穀辐”联盟体系未向网络化转型;当核心变量发生变动时,若重要变量亦发生变动则加速该联盟体系向网络化转型。

二、美国“穀辐”联盟体系的现状

拜登政府在其“印太”战略报告中强调,美国除了深化与“穀辐”盟友的联系之外,更要加强与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越南和太平洋岛屿等主要区域合作伙伴的关系,并且鼓励其盟友和伙伴互相加强联系,特别是日本和韩国。^[4]由此可见,美国意图推动其“穀辐”盟友融入“印太”网络化联盟体系。概因当前地区秩序具有消耗作用且难以制衡该地区潜在威胁,美国放弃双边联盟并重建新型联盟的沉没成本高昂,而在霸权实力相对衰落

表1 联盟体系转型的评估标准

变量类别	衡量标准	亚太“穀辐”联盟体系	“印太”网络化联盟体系	联盟体系是否转型
核心变量	关系结构	“穀辐”式	网络式	是
	联盟性质	攻防一体	平时联盟	
	成员数量	一主导国、五盟国	一主导国、多盟伴	
	地缘范围	亚太地区	“印太”地区(+欧洲地区)	
	运作模式	双边主义	小多边主义(伪多边主义)	
	合作议程	军事防务为主、其他为辅	议程多元泛化	
	防范对象	美国特定盟友(+苏联)	中国	
重要变量	基本目标	稳定地区秩序	制衡潜在威胁	否
	主要功能	约束盟友	责任分担	
	盟伴选择标准	美国实力优先	盟伴能力优先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的背景下,推动“穀辐”联盟转型的成本微乎其微,且转型后的网络化联盟具有更高的实力融合与责任分摊效用。不可否认,“穀辐”联盟体系在历史上发挥的秩序稳定、能力聚合与政治联谊效应在冷战阶段发挥过作用,但相较于网络化联盟体系,其秩序稳定与制衡威胁的效应大大减弱,结构性矛盾日渐突出,难以支撑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部署。

(一)“穀辐”联盟体系的特性

“穀辐”联盟体系是二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的维持地区安全秩序的基本架构,在冷战期间发挥过重大作用。

第一,稳定秩序效应。根据传统均势论,联盟的产生以联盟国家之间的共同假想敌为前提,任何带有防务协定性质的军事联盟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秩序稳定效应。一方面,霸权国通过联盟形式束缚亚太地区国家。二战结束伊始,美国单独占领日本,解除日军武装和军事机构,实行彻底裁军政策,并于1951年签订《美日安保条约》。其目的之一就是要摧毁日本法西斯势力,解构这架战争机器,防止日本军国主义重燃,既能提高亚太国家安全系数,又能保证美国在太平洋军事前哨基地的安全。另一方面,霸权国通过联盟形式制衡潜在地区势力。1947年夏天,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敏锐地认识到日本的地缘战略重要性,指出美国对日本的彻底裁军政策已然过时,继续这种政策容易导致其加入苏联集团。^[9]此时美国政策界似乎开始意识到防止日本倒向共产主义集团并且共同制衡苏联的最好形式就是打造美日安全联盟。

第二,能力聚合效应。长期以来,联盟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跨国能力聚合来增强集体安全的有效方法。权力的聚集对威慑有重要影响,因为联盟中的任何特定国家都获得了权力,提高了其威慑能力(特别是与大国紧密结盟时),从而提高了其在危机局势中成功讨价还价的能力。^[10]美国在韩国不仅建立了军事基地,还在2016年部署了“萨德”系统,随后美国再次宣布在韩国部署新的军事力量。“萨德”反导系统的作战半径可达1000至2000千米,用来制衡朝鲜核威胁,监控东北亚地区核力量,具有攻势的防御导

弹袭击为实施联合作战提供了有力保障。

第三,政治联谊效应。西弗森(Randolph M. Siverson)和斯塔尔(Harvey Starr)通过研究发现,各国更愿意和那些与其意识形态、价值规范与文化认同等方面关系密切的国家结盟。^[11]贝内特(D. Scott Bennett)和斯塔姆(Allan C. Stam III)扩展了这一观点,他们认为,通过联盟进行合作可以随时间推移形成共同的体制结构,从而提供激励或机制来避免冲突。更重要的是,民主等政治规范逐渐成为一种空间集群,这也带来了经常与朋友的朋友成为朋友的益处。^[12]由于没有几个国家能够像霸权国那样具有不受限制的全球军事投放能力,因此与邻国以及邻国的盟友塑造友好关系可以提高国家安全,甚至有助于缓和地方争端。

(二)“穀辐”联盟体系的结构性矛盾逐步加深

冷战以降,世界多极化趋势增强,亚太地区部分国家开始逐渐崛起,美国虽凭借“一超多强”的实力纵横捭阖,但其构建的“穀辐”联盟体系相较于网络化联盟体系,制衡威胁的效应大大减弱,难以支撑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部署。

第一,“穀辐”联盟体系的结构特点决定了压力重心最终落在美国身上。“穀辐”联盟体系不同于北约的集体安全机制,其结构是双边性质的且富含条块状特点。少数联盟关系的破裂虽然并不影响整个安全架构,但如果竞争对手集中战略资源向美国单个盟友施压时,压力最终只会转移到美国身上,其他盟友难以进行战略支援。^[13]在这种制度设计下,安抚盟友需要美国在领土争端、贸易竞争或军备威慑等各项议题上有更大的意愿去对抗对手。如澳大利亚防务状况的第一个可能制约因素就是来自其与中国密切且不断增长的经济关系,这一关系促进了其国内繁荣,但也造成了澳大利亚对不对称脆弱性的强烈认知。澳大利亚与美国的联盟、在“印太”地区上升的安全联系以及与中国经济联系之间的紧张关系产生了一系列困境,^[14]澳大利亚认为在安全方面中国存在施压的可能性,因此会向美国寻求更全面的防务承诺。^[15]

第二,“穀辐”联盟体系成员诉求各异决定了其共同制衡威胁的效率较低。“穀辐”联盟体系内的亚

太国家内部纷争极为棘手,影响了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内部凝聚力,导致其共同制衡威胁的效率大大降低。例如,韩国与日本是美国在东北亚地区最亲密的盟友。在低级政治领域,韩国与日本不断爆发贸易争端的同时,两国也因为诸如二战强征劳工赔偿和“慰安妇”等历史遗留问题未达成妥协而互相攻讦;在高级政治领域,冷战之初,美国将驻朝美军部署在非军事区沿线,主要是为了保卫韩国和维持半岛威慑。驻日美军则肩负维护地区安全等更广泛的使命。根据联盟转型的目标,美国将驻韩美军与驻日美军重新配置,为快速部署全球联网部队做好准备。如果驻日美军和驻韩美军在未来几年内分别转变为区域机动部队,韩日及其部队很可能会受到压力。因为韩国发现其希望韩美联盟只关注朝鲜半岛的安全要求似乎被拓展,^[12]但这并不符合韩国利益。上述问题极大限制了韩日合作的空间以及其与美国共同合作对抗威胁的能力。^[13]

第三,“穀辐”联盟体系因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渐不稳定。美国作为安全保证人为所有亚太盟国提供战略保护,只有当霸权国足够强大时,可以向所有盟友提供更广泛的威慑承诺,并在应对联盟系统的所有威胁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穀辐”联盟体系才会稳固。但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动摇了“穀辐”联盟体系的基石。美国相对衰落导致两种连锁反应,一是需要通过网络化联盟的聚集效应共同制衡威胁,二是为其地区盟友“松绑”,让盟友承担更多安全义务。如日本在解除安全限制方面更加咄咄逼人,其近年来愈加先进完善的军事能力,实现了对《东京宪法》第9条的重新解释,即放松对武器销售的限制以及进行了更富雄心的外交行动。^[13]“松绑”反映出美国在该地区的心有余而力不足,这虽然有利于美国假借日本之手牵制中国,但日本与美国讨价还价的能力也得到了相应提升,“穀辐”架构并不像之前那般稳定。而且,日本的对外政策难免造成中、韩、朝的高度警觉,在东北亚乃至“印太”地区不排除陷入新一轮军备竞赛的风险。^[14]

据此分析,“穀辐”联盟体系的基本目标是稳定地区秩序,以防日本军国主义重燃,并试图与苏联争夺势力范围,其功能旨在约束盟友;转型后的网络化

联盟体系更注重制衡中国崛起,其功能是通过集体行动并分担责任的方式转嫁美国的“遏制”压力。虽然两种联盟方式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稳定秩序与制衡威胁的功能,但“穀辐”联盟体系更注重前者,而网络化联盟体系更注重后者。由于“穀辐”联盟体系难以应对新形势下的战略支援、体系内部国家争端以及提供广泛的安全承诺等问题,从而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印太”地区“中美大国竞争”的战略实践,故转型“穀辐”联盟体系已成当务之急。

(三)“穀辐”联盟体系与网络化联盟体系的内在联系

鉴于美国及其地区盟友都倾向于维持美国领导的安全秩序现状,“穀辐”联盟体系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完全让位于网络化的秩序架构。“穀辐”联盟结构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亚太地区安全政治的主要特征。相对于新的区域秩序出现,“穀辐”联盟体系目前处于必要和自然的过渡阶段,这一秩序将越来越多地由小型和多边安全制度管理。然而,一个完全多边的安全秩序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实现,在此之前,以美国为首的“穀辐”联盟体系将继续作为制衡该地区威胁的手段。^[14]一方面,美国领导的“穀辐”联盟体系是助力美国权力从“亚太”走向“印太”,并通向新的区域多边安全机制形成的桥梁,“穀辐”联盟体系并未濒于瓦解而是更加趋于强化,该体系是“印太”地区打造网络化联盟的核心支撑。如AU-KUS就是在美澳双边联盟基础上组建的具有防务安全性质的军事化联盟。另一方面,联盟网络化反映了未来“印太”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的基本取向。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正在加强联系,部分观察人士号召越南加入。^[15]“五眼联盟”更有拉拢韩国、日本与印度形成“八眼联盟”的倾向。^[16]因此,美国欲在“印太”地区打造的并非涉及单一领域的安全共同体,而是囊括了军事、国防、情报、环境、科技与基础设施等在内的多位一体复合型网络化联盟体系。

三、美国“印太”联盟体系网络化转型的多维措施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在亚太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作用不断增强。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直言“大国竞争时代”已来

临。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其外交政策重点之一就是“更新”和“加强”美国的联盟,他认为这些联盟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受到了“破坏”。^[17]拜登政府强化美日、美韩等“毂辐”联盟体系并促使其“毂辐”盟友加入“印太”网络化联盟体系中。此外,拜登政府还颁布了新版“印太战略”,扬言要“塑造中国运作的战略环境”,美国领导的“印太”联盟体系向网络化转型后,在“印太”框架内具有双重战略目标,即维持其在该地区的霸权和威望,并遏制中国的强势崛起,该联盟体系转型后更加注重向盟伴分担责任并借助盟伴力量共同制衡中国。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网络化联盟体系议程多元泛化,故推动转型多措并举,分别体现在军事、经贸、科技、网络安全、情报与环境领域中。当前,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联盟网络环环相扣,日趋复杂。

(一)军事领域:综合威慑与有限硬制衡

拜登政府已经开始在国防政策和“印太”地区的国际参与中强调“综合威慑”(Integrated Deterrence)概念。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Lloyd Austin)提到了“与盟友和合作伙伴携手”设计和实施综合威慑的“新概念”。^[18]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林·卡尔(Colin Kahl)将综合威慑描述为“将美国国家力量的所有工具——核武器、常规武器、太空、网络和信息——整合在一起,并将它们整合到从直接冲突到混合非军事竞争的所有领域”。^[19]美国希望其盟友和伙伴以这种方式联系起来,以扩大和加深威慑效果。

第一,美国重申了对“印太”地区军事盟友和安全伙伴的承诺,并号召在该地区形成一个反对中国的“民主统一战线”。第二,举行多边军事会议,升级防御性武器布置,加强对目标行动的集体一致性。美国在盟国领土上部署常规导弹表明其继续致力于集体防御协定,美国对新型路基常规导弹的投资也将为盟国的联合开发和作战合作提供机会,部署在“印太”地区的新型移动陆基常规导弹有助于抵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陆基战区远程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方面的竞争优势。^[20]第三,美国促进与盟友及合作伙伴的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互通性可以影响“印太”地区美国盟友与伙伴军队的态度,让高级军事官员意识到综合威慑的必要性。美国新版“印太战略”

报告中提到,“美国将与盟友和伙伴合作,深化其互通性,发展和部署先进的作战能力。寻找新的机会来连接我们的国防工业基地,整合我们的国防供应链,以及共同生产关键技术,以巩固我们的集体军事优势。”^[4]第四,在“印太”国家之间开展步调一致的合作议程,以向对手和其他国家表明信誉和决心。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重启以来,四国在安全领域的战略合作“由虚向实”,日益呈现出构筑遏华“联合阵线”的“同盟化”趋势。^[21]2021年9月15日,英美澳宣布建立旨在强化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同盟,AUKUS的第一个主要计划是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舰队。白宫据此声称,“我们采取这一努力是一系列更大步骤的一部分,包括与我们在亚洲的传统安全伙伴——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建立更强有力的双边伙伴关系,并加强与像印度、越南以及更多湄公河地区新伙伴的合作”,^[22]根据“英美澳条约”第四条,“各方承认,在太平洋地区对任何一方的武装攻击将对其自身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危险,并宣布将根据其宪法程序采取行动应对共同危险”。^[23]第五,围绕现实世界场景,利用盟友最先进的军事设施进行复杂的多兵种演习。在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与澳大利亚达成了防务协议,美日印澳四国举行了年度“马拉巴尔”海军演习。2021年,美国海岸警卫队和澳大利亚边境部队联合英国舰队,在“印太”两洋部署了一个航母打击小组,并执行了为期七个月的任务,计划未来在该地区共同扩大威慑活动。^[24]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综合威慑是一种有限硬制衡(Limited Hard Balancing)的手段。保罗(T. V. Paul)讨论了三个制衡概念:硬制衡(hard balancing)、软制衡(soft balancing)与有限硬制衡,每一种策略都归因于不同的威胁级别。有限硬制衡使用于不具有激烈国际冲突性质的环境中,包括选择性的相互防御协议,有限的军事集结、半正式联盟和战略伙伴关系。^[25]美国及其盟友伙伴之所以未使用强制性的“硬制衡”措施概因双方不想在军事上与中国起正面冲突,“我们的目标不是改变中国,而是塑造中国运作的战略环境,我们还将寻求负责任地管理与中国的竞争。”^[26]有限硬制衡下的“蚕食政策”可能

更有利于美国“印太”网络化联盟体系与中国的竞争。

(二)经贸领域:维持领导地位与对冲“一带一路”

美国在经贸领域上并不排斥与中国的部分合作,但其组建“印太”网络化联盟体系主要目的在于对冲中国“一带一路”的影响并维持其经济领导地位。如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称,中国“一带一路”的影响“可能会威胁到美国与帕劳、马绍尔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自由联合协定”。^[26]拜登政府认识到,仅仅通过指责中国“一带一路”并要求其他国家拒绝加入的做法远远不能与中国在“印太”地区角逐,故其希望通过寻找“一带一路”的替代方案来整合盟友与伙伴加强与美国的经贸合作。

“印太经济框架”(IPEF)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经济支柱,服务于整个“印太战略”。为了保持中美经济实力的差距,美国想方设法拖住中国追赶的步伐。通过建立“印太经济框架”,美国企图在数字经济、劳工和环境等重点领域制定规则和标准,以及在亚太地区建立排他性的供应链系统,将中国排除在外,以实现美国的战略意图。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认为太平洋岛屿的地缘政治日益具有挑战性,2018年开始建立年度太平洋安全合作对话。在2019年澳大利亚—美国部长级磋商中,双方承诺“加强与太平洋岛屿伙伴的合作”。这一承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电气项目中得到了体现,日本和新西兰将在2030年前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用电人口比例从13%提高到70%。^[27]2019年,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启动了海外基础设施建设竞争的“蓝点网络”(Blue Dot Network)计划,其目标是在世界范围对提名的基础设施项目进行评估,目的是与中国争夺“印太”地区基建领域的主导权。2021年6月,拜登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时发起了全球基础设施倡议,即“重建更美好的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简称B3W),意在通过各国金融机构的投资,帮助发展中国家缩小40多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需求。拜登政府宣称该方案将由七国集团和其他主要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和伙伴领导,美国会把重点放在“印太”地区。^[28]美国希望B3W能有效防止中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主导地位,并通过B3W推动美国的盟友与伙伴参加到“蓝点

网络”计划中,形成B3W和“蓝点网络”的互动。在2021年10月举行的东亚峰会上,拜登宣布美国将与合作伙伴探讨建立“印太经济框架”,该框架将围绕贸易便利化、数字经济和技术标准、供应链弹性、脱碳和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等方面确定其共同目标。^[29]拜登在11月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强调,“他致力于加强美国与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关系,以促进公平和开放的贸易和投资,并确保印度洋—太平洋的自由和开放。”

(三)科技领域:“小院高墙”与区域拒止

以5G、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已成为21世纪国际地缘政治的显著性特征,美国注意到关键技术对经济增长、国际安全和地区治理的重要性,又考虑到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故其在新兴科技领域采取了依托盟友与伙伴的“小院高墙”措施,即美国政府需确定与美国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核心特定技术和研究领域(即“小院”),进行更严密更大力度地封锁,并划定适当的战略边界(即“高墙”),“小院”之外的其他高科技领域,则可选择性地对外部开放。美国施展技术外交能力,试图建立一个多边技术联盟,在供应链多元化方面进行合作。如QUAD主张建立技术标准联络的四国机制,在其内部建立高级通信和人工智能联络小组,重点关注标准制定活动以及基础标准化的前沿研究。^[30]这种正式的集团可以集中精力确保其联盟体系内供应链的安全和多样化,加强信息共享,使关键供应链更加透明。^[31]

美国及其盟友伙伴的“小院高墙”措施是一种“反介入”与“区域拒止”(Anti-Access and Area Denim)的策略,“反介入”指美国联盟体系的盟友与伙伴阻止对手向其投送科技产品,以防“信息泄露”。拜登政府在2021年11月签署的《安全设备法》全面禁止华为、中兴设备进入美国。美国禁止华为产品进入其5G网络,还禁止华为在5G产品中使用美国技术,并要求英国、日本、韩国与印度等盟友与伙伴禁用华为技术,试图减缓华为在5G市场的崛起和可能的主导地位。美国不仅与盟友和伙伴共同抵制中国的5G技术,还与美国私营部门密切协调,制定数字技术投资标准和中国技术基础设施的替代标准。^[32]

“区域拒止”指限制对手的科技产品在其体系内发展。特朗普政府以抖音短视频海外版(TikTok)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为由展开国家安全审查,2020年9月,美国的应用商店全面下架TikTok。但在2021年6月,美国商务部撤销了对TikTok的禁令。印度在2021年6月以捍卫“领土完整性”的名义封禁了包括TikTok、微信、百度在内的59款中国应用程序(APP),并宣布把对59款APP实行的禁令“永久化”。美国与印度对TikTok的反复“绞杀”极大限制了中国APP在印美的正当发展。

(四)网络安全和情报领域:小多边主义与“俱乐部化战略”

美国及其“印太”联盟体系在网络安全与情报领域方面采取了小多边主义式的“俱乐部化战略”。小多边主义的突出优势在于可以通过减少行动者的数量来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具有排他性、明确的问题导向和较强的功利性;^[33]“俱乐部化战略”就是美国根据不同合作事项选择不同国家结成盟友或合作伙伴关系。二者本质上都是伪多边主义,即排他性的多边主义,主要排斥中国参与“印太”地区事务。

第一,QUAD正在汇集各方力量增强关键基础设施抵御网络威胁的能力,具体细则为:成立一个高级网络小组,主管专家将定期召开会议,推动政府和行业在包括采用和实施共享网络标准等领域的持续改进方面的工作;开发安全软件;发展劳动力和人才;以及促进安全可靠的数字基础设施的可扩展性和网络安全。^[30]第二,“五眼联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正式情报网络,其起源于二战期间盟军情报合作,并在美国推进“印太”联盟网络化的进程中愈加紧密。^[34]2021年9月6日,美国众议院提交了一份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内容包括吸引韩国、日本和印度三国加入“五眼联盟”。^[16]由此可见,“五眼联盟”未来很有可能发展为“七眼联盟”甚至“八眼联盟”。第三,由于朝鲜的核威胁和导弹威胁,日本还改善了与韩国和美国在情报、监视、侦察和导弹防御等领域的三边防御合作。正如一名前五角大楼高级官员解释的那样,“自冷战结束以来,华盛顿一直在寻求整合两个条约盟国韩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无论你在韩国捕获或整合什么,都应该与日本

共享,反之亦然。”^[35]第四,尽管学界针对AUKUS的直接关注主要集中在向澳大利亚交付核动力潜艇的协议上,但该协议还承诺三国“促进安全和国防相关科学、技术、工业基地和供应链的深入整合”,特别是在网络能力、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领域。^[36]第五,美国学术界提议建立“印太”地区的国际海洋融合中心(International Maritime Fusion Centers,简称IMFC),该中心接收所有相关数据,将其融合以产生有价值的信息,并传播威胁情报,通过海上通信线路维护商业和贸易的安全通道,提供海上冲突或事件的预警或监测,促进美国与其联盟体系内国家的影响力,以加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37]

(五)环境领域:有限合作与“甩锅推责”

QUAD对气候变化表示严重关切,在其声明中表示,“四国集团将集中精力于气候议程,包括采取制定2030年国家排放量和可再生能源目标,清洁能源创新,在天然气部门合作减少甲烷排放,并建立负责任和有弹性的清洁能源供应链,形成绿色航运网络,建立清洁氢气伙伴关系在内的诸多措施,以增强气候适应能力、恢复力和防备能力。”美澳新三国也表示对气候问题严肃对待。拜登政府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其议程的核心。这一立场得到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Jacinda Ardern)的支持,并将气候变化描述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无核时刻”。^[38]在拜登政府发起的B3W倡议中,也提出了由七国集团和其他“印太”地区国家一起专注于解决气候变化、健康安全与环境改善的问题。美国与中国在2021年11月共同签署了《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宣言》表示双方将在温室气体排放、清洁能源转型与循环经济等环境领域展开合作。

在环境领域,美国主要通过塑造“甩锅对象”的方式加强内部的团结一致性,即扬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对温室气体排放负责,但美国并未完全拒绝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美国既“甩锅推责”又与中国等国家“有限合作”表明,气候问题涉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需要两国甚至多国合作相向而行,而且环境问题作为低级政治问题,无法与军事、情报安全等高级政治问题相比拟。

四、美国“印太”联盟体系网络化转型的特征

从上述“印太”地区联盟政治的实践来看,当前美国推动“印太”联盟与合作网络化的操作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威胁制衡。“印太”地区进入大国竞争时代使平衡(Balancing)成为该地区国家的重要考量。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认为,国家之所以结盟是为了制衡威胁(Threat of Balance),国家在无政府社会中通过结成联盟保卫自己。^[39]国家有两种平衡方式:一是内部平衡,即通过提高国家自身实力应对威胁;二是外部平衡,即通过建立针对目标国家的联盟来提高相对实力。^[40]“印太”地区国家普遍采取内部制衡与外部制衡相结合的方式应对挑战。在内部平衡上,“印太”国家主要选择增强自身军事与经济实力。而外部平衡反应在“印太”联盟体系网络化的进程中,即对威胁的制衡不仅通过沃尔特等人所言的双边、三边乃至多边联盟制衡威胁,而是通过网络化联盟制衡威胁。网络化联盟体系相较于“毂辐”联盟体系在制衡威胁方面有如下特征。首先,国家受到强国威胁时,除了传统均势论的“抱团取暖”之外,中小国家也愿意欢迎霸权国“主持公道”。地区中小国家的“抱团取暖”加上霸权国无以匹敌的实力地位足以构成一个以霸权国为主、中小国家为辅的地区网络化联盟体系。这个联盟体系既可能由多支“毂辐”式双边联盟构成也可能形成大型集群网络化联盟。在本文中,最优形式,一般也是最可能的形式就是地区国家关系的相互交织及其与霸权国共同或分别签署的防务协定而构成的网络化联盟体系。其次,通过打造网络化联盟既可以做到制衡又可以做到追随强者。在联盟网络中,地区中小国家不仅可以通过“毂辐”双边联盟制衡地区强国,亦可通过与地区其他中小国家合作或共同与霸权国合作制衡该地区潜在霸主。最后,中小国家相互依赖程度在联盟网络

中不断深化的同时,又提升了其与霸权国的依附关系。网络化的节点效应所催生的共同议题加深了中小国家的相互关系,但事关诸如安全与军事等重大紧急议程的设定与解决少不了霸权国的领头羊作用,而且这事关网络化联盟中每个国家的核心利益。

第二,集群效应。即美国与“印太”地区国家推动多支“毂辐”式双边联盟向大型集群网络化联盟方向发展而形成的合作机制化效应。“印太”地区联盟与伙伴关系交错复杂,美国不是参与其中就是对其发挥重要影响。如2021年10月26日,美国总统拜登在与东盟成员国领导人和东盟秘书长参加的美国—东盟峰会上表示,“我重申美国致力于加强与东盟的伙伴关系及其核心地位,并赞扬东盟对印度洋—太平洋的展望。”^[41]在网络化的联盟体系中,美国处于“中心节点”,根据“社会网络”理论,中心节点就是网络中的核心位置,核心位置带来核心权力,因此美国的权力对“印太”国家都发挥着直接或潜在影响。其他国家在美国周围形成密集的合作集群,集群对系统的稳定性具有双面影响。一方面,联盟合作集群被证明是战争或其他争端扩散的机制,^[42]这表明不同集群中国家之间的低烈度冲突有可能升级并扩散为涉及多个国家的大型争端。另一方面,如果各国意识到摩擦扩散的风险增加并采取行动,就存在行为审慎的考量,^[6]在制衡威胁的同时又避免了大规模冲突。因此,联盟网络的集群效应可能会加强国际体系的稳定性,也可能会无法阻止出现严重的冲突。

第三,议程多元。长期以来,联盟一直被视为双边行为,传统的联盟关系旨在维持防务合作安全,其他合作议程只不过囊括在安全议程之下被作为低级政治来处理。美国在二战之后打造的“毂辐”联盟体系核心议题就是保障五个主要盟友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并防止其卷入本可避免的地区争端,起到一条“缆绳”的作用。如美日、美韩地区同盟在冷战时期

表 2

美国“印太”网络化联盟体系盟友及伙伴关系

区内传统联盟国家(5个)	区外关键盟友(3个)	伙伴国家和地区(4个)	新伙伴国家(8个)	保持接触伙伴(4个)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	英国、法国、加拿大	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新西兰、蒙古国	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马尔代夫、孟加拉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缅甸、老挝、柬埔寨、太平洋岛国

资料来源:刘雨辰.美国“印太”联盟的网络化:结构—关系的视角[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1(4):69.

对抗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扩张过程中发挥过重大作用,但美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日韩与苏联陷入更持久的冲突。^[41]当前“印太”地区联盟网络化的政治实践拓展了议程。其一,单一合作议程已经让位于多元议程。即地区国家的关注点不只局限于安全防务,还在诸如应对新冠肺炎等流行病的公共卫生问题、全球变暖的气候变化危机、新兴领域技术合作、抵御网络威胁、太空空间的建设、基础设施的振兴、人文交流与教育等方面展开多方合作。其二,低级政治领域议程作用凸显,高级政治领域议程作用相对下降,国家的关注点亦从传统安全议题向非传统安全议题过渡。正如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所说的新冠肺炎疫情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一样,“印太”地区乃至全球各国领导人都在处理这场危机,病毒溶解扩散效应不分国界,没有国家能够通过独自努力战胜疫情。

第四,节点防御。节点防御是一种混合的联盟系统,在这种结构中,盟国通过不同的防御合作形成的几何结构进行连接,围绕特定的职能角色,以应对不同的威胁。我们正在目睹“印太”地区双边、小型和多边倡议的累积交织,共同组合成了一个“大联盟”体系,这是美国领导的“印太”联盟体系不断演变的结构特征。由多边主义旗帜下的轴心国家、辐条国家形成的节点防御系统如何在组织联盟系统成员之间的功能专业化和职能专门化以应对特定威胁方面各不相同。职能专业化是指一个国家在联盟系统内专注于特定任务(或角色)的程度,而功能专门化则围绕各种威胁展开。^[42]首先,“印太”地区新形式的防务合作已经建立;其次,防务安排网络已经扩大;再次,人们更加重视该地区多边安全机构的作用;最后,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通过发展双边伙伴关系、小型横向安排(如泰国、日本、韩国)和多边场所(如QUAD或多国区域军事演习)扩大了与地区国家的合作途径。^[43]四种动态的结合促使“穀辐”联盟体系向“印太”网络化联盟体系过渡。

第五,区域联动。美国多次调整其全球战略,从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到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越来越多的国家被纳入美国的“印太”网络化联盟体系中。其一,“印太”地区内部国家联

动。即在地理范围上属于“印太”范围内的国家互相结盟或合作,或与美国结成各式各样的合作网络。其二,“印太”国家与欧洲地区联动。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积极与美国、北约展开配合,对俄罗斯实施外交及金融制裁,驱逐俄罗斯外交官,并向乌克兰提供防务物资。2022年6月,日本出席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北约峰会。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举动,未来并不排除日本成为北约的“特殊伙伴”或“准成员”来积极配合美国遏制中国并制裁俄罗斯。此外,2022年5月5日,韩国国家情报院宣布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CCDCOE),由此成为该组织第一个亚洲成员。CCDCOE属于国际军事组织,旨在通过培训、研发、演习等方式,加强北约及其成员国、伙伴国之间在网络防御领域的的能力、合作和情报共享。^[44]其三,欧洲国家与“印太”地区联动。诸如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或立陶宛这样的域外国家也被美国“邀请”参与“印太”事务。2021年4月16日,欧盟成员国通过了一份名为《欧盟印太合作战略》(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的文件表明,欧洲有意加强在“印太”地区的作用。^[45]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领导下,“法国对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关注明显增强,明确强调该地区的‘法国利益’。”^[46]2020年,德国发布的《印度洋—太平洋准则》(Indo-Pacific Guidelines)宣称该地区为“德国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47]白宫简报室在2021年11月23日发布的美国—立陶宛战略对话简报中提出,“美国和立陶宛讨论加强‘印太’地区合作的机会……应对许多共同的全球挑战和机遇,特别是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挑战和机遇。”^[48]其四,“印太”国家与欧洲国家联动。法国还寻求加强与印度的关系,2020年9月9日,法国、印度和澳大利亚通过视频会议举行了首次三边对话,在2021年2月举行第二次三方对话后,法国海军舰艇抵达印度喀拉拉邦展开友好访问。2022年5月5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于伦敦签署一项新防务协议——《互惠准入协定》(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该协定将允许日本和英国军队共同开展训练、联合演习和救灾行动,深化两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合作,而英国是第一个与日本签订此类协议的欧洲国家。^[49]由此来

看,以美国为首的“印太”—欧洲联盟体系正在合流从而形成一张密如织网、议题广泛、相互交错的横跨印度洋—太平洋—大西洋的超大复合型联盟体系,并不排除未来升级为“印欧”联盟体系的可能性。

五、美国“印太”联盟体系网络化转型的张力与限度

美国在“印太”地区推动联盟网络化的信心与动力十足,这不仅出于美国在相对实力衰退背景下欲向盟友伙伴分摊责任且注重“集群效应”来护持地区霸权的考量,还出于“印太”地区国家迎合美国并将其作为安全保证人的需要。美国强化亚太“穀辐”联盟体系并推动其向“印太”网络化联盟体系方向发展是未来十年乃至二十年最有可能的走向。首先,通过联盟或合作可以聚集权力,而权力的聚集对威慑有重要影响。因为联盟或合作中的任何特定国家都获得了相应权力。美国本就强大的实力可以通过联盟网络效应得到加持,“印太”国家与美国紧密结盟或合作可以提高其威慑能力,从而提高了二者在危机局势中成功讨价还价的能力。^[6]其次,“穀辐”联盟体系的支撑作用强化了美国将联盟网络化的信心与决心。尽管“穀辐”联盟体系缺憾颇多,但其未来并非走向瓦解而是趋于向网络化联盟体系过渡。最后,美国对在欧洲打造北约网络化联盟体系成功遏制苏联的历史经验记忆犹新。冷战期间,美国在乔治·凯南“遏制”大战略的统领之下,先后推动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和欧洲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多边合作平台,并逐步推进北约东扩,挤压苏联战略空间,对苏联实行政治、经济与军事三位一体的全方位遏制战略并导致苏联解体。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如果当前世界处于新两极格局时代,^[49]那么美国会不遗余力推动“印太”联盟体系加速升级,未来十年不排除存有遏制中国的倾向。

可以预计,美国将在以下方面付出努力推动其“印太”联盟向网络化方向发展。首先,美国将“印太”地区域外国家尤其是更多欧洲盟友囊括进“印太”联盟体系中来。这不仅因为域外国家参与“印太”地区事务已有先例且深度介入,还因为一些更直接现实的考虑。如英美向澳大利亚转让核潜艇技

术,澳大利亚放弃了其与法国海军集团签订的大约价值400亿美元的建造常规潜艇的协议,这不仅造成了法澳尴尬的外交局面,也动摇了美法之间的信任基础。鉴于此,未来美国很有可能在“印太”地区的其他事务上与法国达成谅解与合作,并邀请法国参与“印太”事务。其次,美国与盟友和伙伴将在“印太”地区内部深度强化以军事合作为主、其他合作为辅的全方位联盟体系。奥兰·扬(Oran R. Young)对协商型机制和加强型机制进行了区分。前者以参与者明确同意为特征;而后者是由居于主导地位的行为体精心构建的,即主导者综合利用增强凝聚力、推进合作和刺激利诱等手段,使其他参与者服从规则的要求。^[50]这与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对国际秩序构建的分析具有相似之处,他指出,在秩序构建中,权力因其后果影响有所减少而被“驯服”,最强大的国家和其他国家建立了机构磋商的规则和制度,并建立了国际秩序,这也是在其他国家的同意下建立起来的。^[51]最后,如果美国是一个足够理智的国家,不排除其邀请中国参与“印太”地区除安全防务以外的合作议程。如像全球气候危机与新冠肺炎流行病等跨国、跨地区挑战,需要中美相向而行而不是战略竞争。尽管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推动“印太”地区联盟网络化的努力有增无减,但以下因素极大限制了该联盟体系转型的程度,以致美国领导的“印太”网络化联盟体系如欲打造为对抗中国的“印太版北约”行之维艰。

第一,美国自身的内外交困。随着美国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复苏,美国民众对其国家的全球领导地位和责任越来越表示怀疑,也越来越不赞成“亏本”的自由贸易和“鲁莽”的对外干预。因此,打着“美国优先”旗帜的唐纳德·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随即决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巴黎气候协定》,并警告其盟友不要成为地区安全的“搭便车者”。尽管许多专家批评特朗普的鲁莽和轻率,但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坚持认为,现在是将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转向更克制、更审慎的时候了。^[52]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霸权战争周期理论认为,霸权国保持体系支配地位的成本不断扩大,同时经济、技术、军事方面的优势和创新向那

些曾经落后的国家转移,那么霸权国最终会拖累自己造成衰落。^[52]乔治·莫德斯基(George Modelski)的霸权周期理论认为,在国际体系的变革的第四个阶段——分散化阶段——又称为联盟阶段,世界领袖的权力衰落到低点,一个或多个挑战国组织起新的联盟。^[53]而霸权国并非无动于衷,他也可以组织起新的联盟对抗挑战国家。由此可见,本已战略透支的美国在应对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这一国际挑战时,不得不更新、组建新的联盟体系进行围堵与遏制,这姑且可以称之为美国陷入了“霸权维持困境”,即霸权国为了护持霸权与组建新的联盟体系制衡挑战国而不得不进行源源不断的战略投入来维持国际领导地位,当战略透支程度超越其可承受程度的临界点时,这既是霸权国的权力巅峰时刻又是地位消亡时刻。

第二,美国盟伴对地区合作机制的疑虑。国际合作是在分散化、缺乏有效制度和规范的背景下进行的,也是在文化上相异、地理上相分离的实体之间进行的。因此要进行合作,就有必要充分了解各成员的动机和意图,克服因信息不充分所带来的问题,合作理论的核心是合作的动力或收益要超过单边行动的动力或收益。^[54]美国可以不处理“印太”地区中小国家联盟或合作的意见分歧但不能忽略其利益诉求。“印太”地区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二元格局已经确立,该地区国家已经与中美形成了双重复合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国是诸多国家的最大产品出口国与进口国,美国如欲强行与中国脱钩或促使该地区国家与中国脱钩或直接对抗都是不明智且不现实的。如在“五眼联盟”内部,就出现了不同声音。新西兰外长表示对“五眼联盟”扩大职权范围感到不安,新西兰也反对借由“五眼联盟”来“对一系列超出‘五眼联盟’职权范围的问题进行集体发声”。^[55]韩国采取“有限对冲战略”,根据情况有弹性地执行最合适的应对策略,据此管理韩美同盟并扩大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开展以国家利益为优先的外交安全政策。^[56]另外,所谓的美日印澳“四国联盟”也并非铁板一块。澳大利亚虽然站在对抗中国的前台,但其经济严重依赖中国,所以在很多核心问题上仍有所顾忌。印度虽然和中国有边境摩擦,但其一直坚持不结盟原

则和“邻国优先”的周边政策,且中印互为邻邦,所以印度应该不会彻底倒向美国去对抗中国,如今似乎也只是借美国之手牵制中国。正如合作机制可以建立在共同利益上一样,机制也可能是哈斯(Ernst B. Haas)所声称的共同排斥(common aversion)的产物。在这种机制中,行为体不能就共同期望的结果达成一致,但对共同避免的结果却有着一致的意见。^[57]

第三,“印太”地区国家的多重考虑。在将“印太”区域安全环境与欧洲安全环境进行比较时,学者们普遍认为,“印太”各国能力的差距、组成国家的异质性、合作精神的缺乏、旷日持久的领土冲突与历史上的敌意都是该地区建立有效安全机制的障碍。^[58]“印太”国家游刃于中美两大世界强国之间,现在正在寻找确保安全和促进繁荣的方法,因为他们既怀疑崛起大国的意图,又怀疑衰落大国的承诺。与此同时,他们必须同时考虑前者的经济机会和后者的安全保障。这让“印太”国家陷入了两难境地,需要对中美竞争表现出不同的反应。这一困境也转化为“印太”国家对美国“印太战略”的立场。一些“印太”国家赞同美国的“印太战略”。例如,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热衷于加入以美国为中心的地区平台,来影响“印太”地区军事和经济秩序。然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内部也矛盾重重。印度与俄罗斯的密切联系是印美关系不和的根源之一,战略自治原则深深植根于印度的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情结中,以致在俄乌冲突期间,印度对美国要求其抵制俄罗斯的行为视若无睹。印度这一做法的思维逻辑很清晰,即印度希望在外交政策方面保持自治和独立,同时又享受与美国密切关系带来的安全利益。^[58]其他国家也在谨慎地考虑美国领导的“印太战略”,并冒着与中国关系紧张的风险。格林(Michael J. Green)写道,“如果韩国的核心利益没有承受相当大的风险,他就无法在美国和中国或日本和中国之间架起桥梁”,^[59]韩国可能会继续追求其“战略模糊性”,直到不再是一种选择,同时加强与美国和其他四方国家的非军事合作,作为对华盛顿的让步。^[60]包括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在内的大多数东盟国家往往对美国“印太战略”的潜在挑战持谨慎态度,因为这可能会冲击东盟中心地位。这些国家考虑的实质是避免与

大国竞争挂钩,确保自己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同时在大国竞争中减轻潜在损害,以确保自身的灵活,一个可取的政策选择是依靠区域多边机制保证其话语权和独立性,^[5]而不是选边站队,矗立在大国对抗的前沿地带。

六、结语

综合来看,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和伙伴都倾向于维持美国领导的地区安全秩序,并不断加深与中国的经济联系。“穀辐”联盟体系在短期内不会转化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海陆“印太”地区划分的秩序架构。但不能否认的是当前“印太”秩序结构正在向美国领导网络化联盟体系过渡且取得明显进展。另外,该地区的多边主义也不可能在未来完全取代“穀辐”联盟体系,因为在“印太”地区如何组织及实现多边安全的问题上,达成且落实任何共识的效率都很低。^[6]这既与该地区的历史传统有关,又与当前大国权力竞争与转移态势有关。

那么美国当前推动的“印太”网络化联盟体系有

没有可能成为冷战时期遏制苏联的北约军事化联盟体系呢?根据现实主义的悲观预测,目前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必须明确的是如若在“印太”地区组建联盟,那么该联盟必须针对事关人类前途与命运的特定威胁而非旨在遏制特定国家。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其他盟友、伙伴必须向历史经验吸取教训,以防止“遏制”叙事占据主导地位。其二,中国与“印太”地区国家甚至美国之间的复合相互依赖关系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能比拟的,高度军事化的联盟旨在威慑或制衡特定国家,这与“印太”地区大部分国家的利益并非协调一致。其三,世界已经形成新两极格局的论调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中国坚持不结盟、不称霸原则,中国也无意与美国争夺世界霸主地位。中美这两个世界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大国需准确判断两国关系性质与世界未来的发展走向,任何单方面的战略误判都将会对“印太”地区和世界秩序造成深远且难以弥补的影响。

注释:

①美国“穀辐”联盟体系的盟友是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泰国。需要指出,本文中的“穀辐”联盟体系主要指涉亚太地区;网络化联盟体系主要针对“印太”地区。美国“印太”网络化联盟体系主要指在美国亚太“穀辐”联盟体系基础上的环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所组建的新联盟形成了纷繁复杂、交织成网的联盟体系。

参考文献:

- [1]Dian, Matteo, Hugo Meijer. Networking hegemony: alliance dynamics in East Asia[J].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57, No.2, 2020: 132-134.
- [2]任琳,郑海琦.联盟异化的起源[J]. *国际政治科学*, 2021(2):35.
- [3]Kih, Jiyun, Jaechun Kim. The Capabilities-based Analysis of Alliance Transform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Focusing on the ROK-US and US-Philippines Alliances[J]. *The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14, No.3, 2016: 371.
- [4]The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R]. 2022: 5-13.
- [5]Kennan, George F. *Memoirs 1925-1950*[M]. Plunkett Lake Press, 2020: 375-381.
- [6]Cranmer, Skyler J., Bruce A. Desmarais, Justin H. Kirkland. Toward a network theory of alliance formation[J].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38, No.3, 2012: 298-306.
- [7]Siverson, Randolph M., Harvey Start. Opportunity, willingness, and the diffusion of war[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4, No.1, 1990: 47-67.
- [8]Bennett, D. Scott, Allan C. Stare III. *The behavioral origins of war*[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74.
- [9]左希迎.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会走向瓦解吗[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9(10):66.
- [10]Fontaine, Richard, et al. Networking Asian security: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order in the Pacific[R]. 2017: 27.
- [11]谢晓光,杜洞光.威胁制衡视角下美国“印太”联盟体系转型[J]. *南亚研究季刊*, 2022(2):8-9.

- [12]Nam, Chang-bee. The Alliance Transformation and US-Japan-Korea Security Network: A Case for Trilateral Cooperation[J]. Pacific Focus, Vol.25, No.1, 2010: 34-58.
- [13]Akimoto, Daisuke. The Abe Doctrine: Japan's Proactive Pacifism and Security Strategy[M]. Springer, 2018.
- [14]Jae Jeok Park. The US-led alliances in the Asia-Pacific: hedge against potential threats or an undesirable multilateral security order?[J]. The Pacific Review, Vol.24, No.2, 2011: 137-158.
- [15]Jung, Sung Chul, Jaehyon Lee, Ji-Yong Lee.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US alliance network expandability: Asian middle powers' positions on Sino-US geo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Indo-Pacific region[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30, No.127, 2021: 56-64.
- [16]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M]. 2021.
- [17]Joseph Biden. The power of America's example: the Biden plan for leading the democratic world to meet the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EB/OL]. <https://joebiden.com/american-leadership/>, 2022-05-08.
- [18]Lloyd J. Austin III, Secretary of Defense Remarks for the U.S. INDOPACOM Change of Command Ceremony[EB/OL]. <https://www.defense.gov/News/Speeches/Speech/Article/2592093/secretary-of-defense-remarks-for-the-us-indopacom-change-of-command/>, 2022-05-06.
- [19]Colin Kahl. Keynote Address: Colin Kahl 2021 Carnegie International Nuclear Policy Conference[EB/OL]. https://ceipfiles.s3.amazonaws.com/pdf/Colin+Kahl+Keynote_Transcript.pdf, 2022-05-08.
- [20]Schreer, Benjamin. After the INF: What Will US Indo-Pacific Allies Do?[J].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43, No.1, 2020: 147.
- [21]孙通. 美日印澳战略互动对地区秩序的影响——基于体系结构视角的分析[J]. 东北亚论坛, 2021(6):96.
- [22]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Harris on the Indo-Pacific Region[EB/OL].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8/24/remarks-by-vice-president-harris-on-the-indo-pacific-region/>, 2021-12-01.
- [23]Michael Cohen, Andrew O'Neil. Doubts down under: American extended deterrence, Australia, and the 1999 East Timor crisis[J].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 Vol.15, No.1, 2015: 27-52.
- [24]Hardy, Jane. Integrated deterrence in the Indo-Pacific: advancing the Australia-United States alliance[R]. 2021: 9.
- [25]Pape, Robert A.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0, No.1, 2005: 7-45.
- [26]Ethan Meick, Michelle Ker, Han May Chan. China's engagement in the Pacific islands: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staff research report[EB/OL].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China-Pacific%20Islands%20Staff%20Report.pdf>, 2022-09-15.
- [27]Wallis, Joanne, Anna Powles. Burden-sharing: the US,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alliances in the Pacific islands[J].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7, No.4, 2021: 1064-1065.
- [28]Zongyou, Wei, Zhang Yunha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J]. China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Vol.7, No.2, 2021: 167.
- [29]The White House. Readout of President Joe Biden's Participation in the APEC Virtual Leaders' Meeting[EB/OL].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11/12/readout-of-president-joe-bidens-participation-in-the-apec-virtual-leaders-meeting/>, 2022-05-01.
- [30]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Quad Leaders' Summit[EB/OL].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24/fact-sheet-quad-leaders-summit/>, 2022-05-10.
- [31]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The Tangled Web We Wove: Rebalancing America's Supply Chains[R]. 2022: 24.
- [32]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Advancing a Liberal Digital Order in the Indo-Pacific[R]. 2021: 17.
- [33]王晓文. 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背景下的小多边主义——以美日印澳四国战略互动为例[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20(5):61.
- [34]Andrew O'Neil. Australia and the "Five Eyes" intelligence network:the perils of an asymmetric alliance[J].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71, No.5, 2017: 533.
- [35]Simón L, Lanoszka A, Meijer H. Nodal defence: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US alliance systems in Europe and East Asia[J].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44, No.3, 2021: 360-388.
- [36]CSIS Briefs. The Case for Cooperation: The Future of the U.S.-UK Intelligence Alliance[R]. 2022: 7.
- [37]Canyon D, Turvold W, McMullin J. A Network of Maritime Fusion Centers Throughout the Indo-Pacific[J]. Security Nexus, 2021: 2-3.

- [38] Jacinda Ardern, Labour's next steps to reduce climate emissions[EB/OL]. <https://www.labour.org.nz/release-labours-next-steps-to-reduce-climate-emissions>, 2021-12-01.
- [39] 斯蒂芬·沃尔特. 联盟的起源[M]. 周丕启,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20-23.
- [40] Vasquez, John A.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1, No.4, 1997: 899-912.
- [41] The White House. Readout of President Biden's Participation in the U.S.-ASEAN Summit[EB/OL].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10/26/readout-of-president-bidens-participation-in-the-u-s-asean-summit/>, 2022-05-04.
- [42] Oren I. The war proneness of alliances[J].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34, No.2, 1990: 208-233.
- [43] 韩国情报机构加入北约网络防御组织[EB/OL]. 光明网, <https://m.gmw.cn/baijia/2022-05/05/1302931787.html?sdkver=771db3e7>, 2022-05-06.
- [44] Pierre Morcos. The European Union Is Shaping Its Strategy for the Indo-Pacific[EB/OL]. <https://www.csis.org/analysis/return-quad-will-russia-and-china-form-their-own-bloc>, 2022-05-05.
- [45] Soumyadeep D E B, WILSON N. The Coming of Quad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Indo-Pacific[J]. *The Journal of Indo-Pacific Affairs*, Vol.4, No.9, 2021: 117-118.
- [46] Ulatowski, Rafa[D7AH303.JPG]. Germany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strengthening the liberal order and regional security[J].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8, No.2, 2022: 384.
- [47] The White House. Statement by NSC Spokesperson Emily Home on the U.S.-Lithuania Strategic Dialogue on the Indo-Pacific[EB/OL].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11/23/statement-by-nsc-spokesperson-emily-horne-on-the-u-s-lithuania-strategic-dialogue-on-the-indo-pacific/>, 2022-05-06.
- [48]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英, 签署协议允许两国军队共同部署[EB/OL]. 观察者网,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1986734119811901&wfr=spider&for=pc>, 2022-05-05.
- [49] 赵华胜. 中俄美关系与国际结构: 从多极到两极? [J]. *国际关系研究*, 2020(4): 3-20; 阎学通. 2019年开启了世界两极格局[J]. *现代国际关系*, 2020(1): 6-8.
- [50] Young O. R. Regime dynamics: the rise and fall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6, No.2, 1982: 277-297.
- [51] 约翰·伊肯伯里. 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M]. 赵明昊,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 [52]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33.
- [53] George Modelski, William R. Thompson. *Long Cycles and Global War*[M].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23-54.
- [54] 多尔蒂, 普法尔茨格拉夫.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 阎学通, 等, 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3: 536.
- [55] 新西兰外长: 对“五眼联盟”扩大职权范围向中国施压感到不安[EB/OL]. 央视新闻,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7467569165407996&wfr=spider&for=pc>, 2022-04-25.
- [56] 詹德斌. 韩国对美国“印太战略”的认知与政策[J]. *东北亚论坛*, 2021(2): 24.
- [57] Haas, Ernst B. Words can hurt you; or, who said what to whom about regimes[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6, No.2, 1982: 234.
- [58] Puthan Purayil, Muhsin.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question of an Indo-US alliance: A perspective from India[J]. *Asian Affairs*, Vol.52, No.1, 2021: 67-68.
- [59] Green M. J. Korean middle power diplomacy and Asia's emerging multilateral architecture[J]. *The Korean pivot: The study of South Korea as a global power*, 2017: 17-34.
- [60] Abbondanza, Gabriele. Whither the Indo-Pacific? Middle power strategies from Australia, South Korea and Indonesia[J].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8, No.2, 2022: 414.